

READING CHINESE LITERATURE OR READING CHINA

读中国文学还是读中国

An Intercultural Thematic Reading Approach to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TCSL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urriculum

兼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主题阅读法

Yongyang (Catherine) Wang

王永阳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READING CHINESE LITERATURE OR READING CHINA

读中国文学还是读中国

An Intercultural Thematic Reading Approach to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TCSL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urriculum

兼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主题阅读法

Yongyang (Catherine) Wang

王永阳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读中国文学还是读中国: 兼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主题阅读法 / 王永阳著. —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81126-043-4

I. 读… II. 王… III. 汉语—阅读教学—对外汉语教学—
教学研究 IV. H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8912 号

读中国文学还是读中国

—— 兼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主题阅读法

著 者: 王永阳

责任编辑: 黎仁

设计制作: 甘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 贵阳快捷彩印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05×140mm

印 张: 10

字 数: 101 千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6-043-4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 8292951

给二月

我的青春、我的爱 and 那美得让人心痛的年轻岁月

*For my mentor and friend, Trevor Hay
(Hai Lei), for his support, encouragement,
sympathy, understanding and inspiration*

*For my parents and grandma who called
me 'wild pony'*

自序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比分析针对中国学生和针对外国留学生的中国文学课程的教学，探索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与研究中的新视角和以学生为导向的新的文化阅读法。本书以社会符号学 (social semiotics)、比较教育学 (comparative education)、文化学理论 (cultural studies)、基于批判性文化研究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的比较文学批评和课程理论及跨文化交际学 (cross-cultural/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为理论基础，以文本分析 (textual analysis) (Scott, 2006; Peräkylä, 2005) 为研究方法。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外国留学生 (outsider/“局外人”) 与中国学生 (insider/“局内人”) 是两个不同的读者群体。然而，目前针对这两个不同读者群的中国文学课程在材料选择和教授方法上似乎存在一定程度的雷同。这种雷同反映出对外汉语文学相关课程受到中文作为母语的教育传统和实践的深刻影响。把面向局内人的课程内容和方法过多地搬用于面向局外人的教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不同于母语教学的特点，有碍于这种特点在教学选材和教学方法上的体现。同时，也有违对外汉语教学“学生中心”的原则，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局外人视角的缺失。在此基础上，本书尝试性地提出针对留学生特点和需要的新的阅读法 - 以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的的跨文化主题阅读法。其目的在于通过创新性的阅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并更有效地进行文化教学和文化传播。

文学，作为“人学”、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可以作为解读中国文化、探索“交际文化” (张占一, 1990¹)、“主观文化” (Bennett, 1998)，进行“文化诠释”的文本。文学作品，包括古代、现代和当代文学，包括文学经典、流行文学和非主流文学，为这样的文化解读提供了丰富的文本。基于当代批判性文化研究的文学批评、比较文学批评和跨文化交际学为这样的解读提

张占一先生在 1984 年提出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的概念，在 1990 年进行了进一步诠释。

供了独特的视角和解读依据。从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的出发来进行阅读，文学作品就成了一个充满文化意义的、亟待开发的宝库。

本书提出的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主题阅读法”，是针对汉语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它不同于当前的教学实践，从目的上来看，提出了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标；从内容上讲，力图打破文学经典文本的制约，扩大文本的选择范围，增加选文的多样性、目的性、相关性和当代性；在教学方法上，不以审美和文学赏析为重点，而是重在阐释和解读文本的跨文化交际意义。运用多种教学手段，诸如小组讨论、角色表演、电影脚本、图片和互联网资源等辅助手段，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和趣味性。

本书的基本内容是作者在墨尔本大学教育研究院所做的博士论文，主要读者对象是对外汉语²本科专业的学生。用英文出版并未对结构做较大改动的原因主要是：

1. 希望本书可以为有望到澳洲撰写博士论文的研究生提供參考；
2. 提高英文能力是对新一代国际汉语教师的迫切要求。“对于对外汉语教师来说，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必须提高自己的双语能力”（李晓琪，2006，综述第10页）。在国家汉办组织编写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Standards for Teachers of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2007）中，外语与中文同时成为对国际汉语教师语言能力和技能的两项要求。同时，对学生母语的掌握是在21世纪国际化和

² 关于“对外汉语”的提法，刘珣先生在2000年指出，“汉语只有一个，不存在‘对外’和‘对内’的不同汉语”。这一术语应该理解为“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与研究的汉语”（赵金铭，摘自李晓琪，2006，代序第10页）。尽管“随着‘国际汉语推广’大局的推进，‘对外汉语’无论是从内涵还是外延看都不能满足已经变化了的形势”（李晓琪，2006）。但是，由于约定俗成等原因，“对外汉语”仍然在较大范围内使用。本书在中文语境中沿用“对外汉语”的说法正是基于对这一用语的实质的理解，即理解为“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与研究的汉语”。同时按照国际学术惯例，将“对外汉语”翻译为“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CSL)”（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

多元文化大背景下进行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是汉语走向世界的需要，是更有效地进行对外语言文化交流的需要，也是更好地实现对外汉语教学“学生中心”原则的需要；

3. 本书的参考书目可以作为学生查阅相关英文资料的索引；
4. 不少对外汉语的著作和文章是第一次在本书中被译成英文。对期望用英文写作的作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用英文写作对外汉语论文，有利于对外汉语研究走向世界，是对外汉语与其他第二语言教学与研究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未来需要和发展趋势。

本研究尝试性地将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发展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学目的中。类似的跨文化阅读法曾于2000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法德意语系试用，学生反映良好 (Maurer, Carroli and Hillman, 2000)。本研究提出的跨文化主题阅读法是这种方法和实践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尝试和运用。当然为了进一步完善这种阅读方法，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思考和研究。比如，如何通过文学对比阅读结合文化对比分析³进一步发掘跨文化主题及其交际意义，寻找跨文化主题是否对千呼万唤难出来的“文化教学大纲”（张英，2004；李晓琪，2006，综述第17页）存在启发借鉴意义，如何在此基础上试办新的课程、开发新的跨文化阅读教材⁴等。

本书是作者三年博士研究的初浅成果，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还望专家不吝赐教。

王永阳

2008年5月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王子公园

³ 毕继万先生指出，“对比分析的方法既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主要方法，也是第二语言教学的重要方法”。（载李晓琪，2006，第156页）。

⁴ 李晓琪先生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2006）一书的综述中指出，国内的文化精品教材和面向海外的文化教材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序（一）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确立以来，对外汉语针对性教学原则受到学科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针对性涉及对外汉语教学的各个方面，比如国别（或地区）的针对性，学习者年龄的针对性，文化程度的针对性，学习目的的针对性，语言起点、语言水平的针对性，学习时间（短期或长期）的针对性，与国别（或地区）针对性相关并且非常重要的还有第一语言、第一文化的针对性，等等。针对性是教育学的一般原则之一，没有针对性，就没有实效性，这种针对性当然也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原则之一。从常规第二语言教学的几大环节（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成绩测试）上看，针对性原则都应该、都必须得到恰当体现。应该说，学科界在针对性教学原则的重要性上是有共识的，我们也看到不少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成果，比如不同类别的针对性教材的编写就是这些成果一个方面。不过，我感觉，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我们多半是不自觉地还受到“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原则的一些影响，加上其他传统观念和做法的一时未能割舍，我们在贯彻对于学习者的个性特别是学习者第一语言、第一文化背景的针对性上，还有不少可以迈步前进的空间，所以有的课本（汉语教材，也包括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类教材如文学类教材等）的选材和内容还是不那么受到学生以及讲授者的欢迎。在澳洲工作的这段期间，我确实不只一次听到中文教师对这方面不足的意见和建议。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说及的是，现在在具有一定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素养的汉语教师中，不接受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交际性原则、不承认技能训练的重要性的人大概不多了。但是对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的交际性原则和跨文化语言交际技能培养的问题，如何处理好知识学习、知识传授和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培养的关系问题，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认识和思考。这里不是说

这个问题现在没有得到学科界的重视，实际上早在“国家汉办”“十五”（2001-2005）科研规划的课题指南中就已经列入了“跨文化语言交际研究”这一项重要内容。这里说及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该问题本身有一定的复杂性，加上我们对文化教学中知识和技能关系的关注相对地说也比对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关系的关注晚一些，或者说是关注得少一些，所以在汉语国际推广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在汉语汉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新形势下，有必要进一步认识、思考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问题。

正是基于以上想法，在得知永阳同志的《读中国文学还是读中国——兼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主题阅读法》即将出版的消息时，我感到十分高兴。永阳同志在这本书中始终注重对外汉语汉文化教学的针对性原则，坚持对于教学对象（学习主体）的个性分析，从跨文化交际学的角度把作为教学对象的外国学生和中国学生区别为“局外人（outsider）”和“局内（insider）”，认为面向两种不同群体而采用过于一致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适当的，应该有所区别。这些都是很在理的话。著者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原则，认为在教学中不考虑不同群体的特点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局外人”视角的缺失。这样的说法令人赞赏。这里说到“视角”的问题，这是给学习过程中的教学对象基于第一语言、第一文化背景观察、理解教学内容以一定的合法性。通过自己的视角来理解、接受，这大概也是跨文化学习、交际过程中的一般现象，也是贯彻“以学生为中心”教学原则的自然的结果。

也正是在这样的跨文化交际学理论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的架构上，本书著者提出了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的“跨文化主题阅读法”。著者说得很明确，就是从针对性上看是为了满足留学生这一群体的学习需要，从教学目的上看是为了提高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我们认为，从原则上说，满足留学生群体的学习需要是理所当然的，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观点切合当今世界不同母语人群运用第二语言进行交际的实际需要。

总之，我感到永阳同志的这本书，提出、分析了如何进一步贯彻对外汉语汉文化教学的针对性原则的问题，也提出、分析了怎样进一步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而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问题。这两方面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和实践中十分重要和迫切的课题，是进一步推进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事业和汉文化国际传播中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著者在本书提出的观点和做法都富于探索性和启发性。

据我所知，在本书撰写期间和书成之后，永阳同志在墨尔本大学和有关学者专家举办了与“跨文化主题阅读法”相关的系列讲座，并且获得良好的反馈。这一系列讲座是对本书教学理念的宣示和实验，目前还在继续。我们期待著者就自己关注的这一课题，能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从而为蒸蒸日上的汉语国际推广事业和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日益发展壮大作出应有的贡献。

是为序。

吴淮南

于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

2008.6.

序 (二)

首先祝贺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王永阳博士所著《Reading Chinese Literature or Reading China: an intercultural thematic reading approach to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TCSL curriculum》(读中国文学还是读中国 - 兼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主题阅读法)。王博士所著本书,以跨文化交际理论等为基础,强调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从学习者的角度,在语言文学教学内容上进行多样化的尝试,打开思路,读毕很受启发。

一、从学习者的角度考虑问题

王博士在书中指出,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由于其生活环境、所受教育与国内学习汉语者完全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习俗和价值观等,也同国内学生有很大差异。因此,王博士在本书中强调,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从非母语学习者的角度考虑问题,采用以非母语学习者为中心的指导原则。这意味着在教学中必须考虑学习者的需要和特点。如果我们仅凭主观的认识和感受去选择教学内容,很可能达不到预想的效果。

简要回顾一下澳大利亚的汉语教学,我们对此可能会有更好的了解。

首先,澳大利亚的汉语教学的发展变化同其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发展这一宏观因素密切相关。其次,人们对外语教学过程的认识不断深入,特别是近年来人们对外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更好理解,都对澳大利亚汉语教学的演变起了积极作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亚太研究院(RIAP) 1996 年的报告谈到,澳大利亚大学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均已开设与中国有关的语言文化课程。但早期澳大利亚高校汉语教学的理念同西方国家研究东方及中国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主要做法就是通过经典文学作品的学习来了解中国文化掌握中国语言。

如上个世纪 50 年代，墨尔本大学从台湾引进教师，开设汉语课。由于那时对文化的理解仅限于所谓高端文化，以此衍生出的汉语学习也以学习古典作品和文学名著的片段为教学主要内容。具有初步汉语知识的本地学生在此阶段以阅读书面作品掌握语法句型为主要任务。有时老师在上课中介绍自我感觉重要的“优美文雅”的文学作品时，十分投入，心情澎湃，深受感动，但观学生，并未分享老师的感受，甚至无动于衷。

上个世纪 80—90 年代，随着澳中两国关系的密切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需求，高校的汉语教学从偏重“阳春白雪”文学作品逐渐转向实用性汉语。大学开始开设商贸汉语、汉语口语，也开始采用大陆出版的汉语教材，更为强调汉语的实用性。部分大学高级汉语课程仍在学习三、四十年代及文革后的一些文学作品，但一般课程的主要教材内容已经从小说诗歌等转向商务交流，大量引入商业汉语、财贸金融、进出口谈判等方面的词汇。很多老师们觉得教学内容枯燥乏味，不少学生却主动投入，动力很足。

进入二十一世纪，借助于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理论的研究成果，澳大利亚高校汉语教学吸取了以上两个阶段的经验，开始认识到文化因素在外语学习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学习真实生活中有广泛应用意义的活的语言，更为重视培养学习者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师生间在教学过程中的互动也有了改变。不再仅仅是学生被动跟读词汇机械模仿句型了。

一般来讲，澳大利亚高校汉语教学所开课程受各校的汉语教学传统和任教老师个人研究领域的影响，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选用的教材也是各自为政。2007 年，中国取代美国日本，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澳大利亚高校对中国的研究以及汉语教学发展迅速，学生人数增加。对中国的兴趣和学习汉语的热情不断增长。在这种大形势下，如何有意识地关注学习者的需求与差异，保持学习者的兴趣，进一步巩固汉语学习的发展势头，已经成为重要和紧迫的研究课题。王博士的著作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二、他山之石与换位思考

近年来，如何培养外语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已经成为衡量外语教学成效的重要考量之一。中国大陆近年来已有诸多学者出版专著译著涉及这一课题并介绍国内外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有关政策。如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 年出版的陈俊森、樊葳葳、钟华三位所编著的“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育”就提及美国外语教学理事会(ACTFL)提出的 5C 目标。该理事会会在 2000 年为外语学习提出此 5C 目标的同时，还以更简洁的语言强调，今日外语教学关键在于培养用外语进行交往的实际能力。该理事会是用这样十个英文词来概括的：

“Knowing how, when and why to say what to whom”

(知道说什么, 何时说, 为何说, 说什么, 对谁说)

这意味着，强调交往的外语教学，必须使学生掌握必要的语言和社会文化知识。教学中除了应继续重视传统上的“how 怎样说”(文法)和“what 说什么”(词汇)的教学外，还需考虑“why 为什么”(这样说)，“whom 和谁说”，以及“when 何时说”这几个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博士在本书中，也谈到了欧盟理事会(COE)提出的“欧洲语言教学共同框架”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四个方面。

随着近年来交通运输和信息通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加拿大人 McLuhan (1970) 提出“地球村”概念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和接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使很多过去的地方经济变成“牵一发而动全身”。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语言，汉语学习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和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强而越来越受到重视，对外汉语也成了中国向外“出口”的重要内容。美国 Joseph Nye (Jr.) (2004) 在其书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中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王博士在本书中也有提及。如何通过对外汉语教学去发展中国的软实力，扩大中国精神思想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如何使众

多海外学习汉语的人能通过语言学习更加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中国，感受中国的悠久历史，理解和欣赏中国的文化内涵。更具体地说，在迅猛发展的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去更有效地推广对外汉语教学，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去考虑进一步加强教学效果的问题；具体到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我们的指导原则是什么，应该教国外学生什么，这些都是对外汉语教学面临的紧迫任务。

在越来越频繁的跨文化交流中，我们已经意识到进行有效交往的重要前提就是要“知己知彼”，要换位思考。法国哲人笛卡尔在 1637 年就说过：“应该了解别人的习俗，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衡量评判审视自己，并确保我们避免像那些孤陋寡闻的人那样，以为同我们的做法与实践不同的就是荒唐无理的”（序言作者译自 Crozet and Liddicoat, p.4, 2000）。王博士在本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中国语言文化“局外人”的视角和值得进一步审慎思考的问题，这对我们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也是一种挑战、一种启发。

中国戏剧大师吴祖光先生曾讲自己“生正逢时”，这里冒昧借用改用。王博士此书“出(版)正逢时”。

高保强(博士)

澳大利亚拉卓博大学
社会人文学院
亚洲研究系

Dr. Bao Q. Gao
Asian Studies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La Trobe University
Bundoora, Victoria 3086, Australia
E-mail: B.Gao@latrobe.edu.au

Acknowledgements

I feel deeply indebted to Dr. Trevor Hay and Dr. Julie White, my supervisors a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who have become not only my supervisors, but also close friends who support me in very many ways in life. I have grown under their instruction and influence, not only in the sense of academic ability but as a person and a woman living overseas, searching for my independence and 'true self'. My monolithic view as an 'insider' of Chinese culture has changed and become more open to diversities, and my eyes are more tolerant to differences. Trevor, in particular, with his extensive experience, knowledge and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Chinese culture, his love for Chinese literature,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 strength in contemporary critical cultural studies, has been an invaluable mentor in my doctoral study. Thank you, Trevor and Julie.

Special thanks are also due to Dr. Ron Price, who read my draft closely and contributed insights and inspiration from his own lifelong China scholarship; Prof. David Holm (贺大卫), Professor of Chinese and Co-director of Confucius Institute (CI) a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who suggested literature resources and helped with translations, and Prof. Wu Huainan (吴淮南), the Director of CI from China.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Prof. Liu Xun (刘珣) from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of. Li Quan (李泉) fro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the other scholars in Australian and China who have helped, enriched and inspired my research. I would like to make special mention of Dr. Peter Ferguson and Dr. Sally Godinho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for their advice,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I also want to thank my external supervisors, Prof Wong Hin Wah (黄显华)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Prof. Zhang Ying (张英) at the Beijing University with whom I did not meet very often, but who offered inspiration, suggestions for reading resources and encouragement through email exchanges.

I would like to devote my special thanks to Prof. Feng Xiaolun (封孝伦) and Mr. Cai Zhijian (蔡志坚) from the Higher Education section at Guizhou province. Mr. Sun Xiaobing (孙霄兵), Mr. Zhao

Yanqing (赵燕清) and Mr. Shao Yipeng (邵亦鹏) a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PRC who assisted with my survey and interview in Beijing.

My overseas experience as a Chinese woman and a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has made friendships a 'must' for survival. During these years, I have made some vital friendships with Chinese women who have supported me and shared the experience and the turmoil with me - the difficulties and confusions as well as the happiness and joy that we have encountered in our overseas living. I would like to thank Tian Hong (田宏/Sarah), Wu Wei (吴慰/Rona), Ye Yang (叶杨/Cindy), Wang Xu (汪旭), Yang Weixia (杨蔚霞/Grace), Liu Hua (刘华/Charlotte), Li Jingyan (李景艳/Lydia), Ye Hong (叶红/Ally), Zhang Ying (张莹/Vicki), Yao Liyan (姚立雁), Chen Chen, Chen Li (陈丽) and her 'daughter' Mary - a very talented German Shepherd who can sing Peking Opera - for the friendship, understanding and encouragement that have carried me through these years of study. Tian Hong, in particular, whom I met in Adelaide, arranged the first accommodation for me in Melbourne and provided great support for my field work in Beijing as well as at other critical moments in my life and study. Thank you, Sarah. It has been my great pleasure and fortune to get to know you.

I am also in debt to those people who, although outside my field, have offered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sustaining me throughout this study. I would like to mention Dr. Ouyang Qian (欧阳谦), Dr. Zhang Zhiwei (张志伟), Mr. Zhu Zhenglin (朱正琳), Ms. Fu Ximing (傅锡明), Mr. Wang Jianfu (王建富), Mr. Tang Dezhi (唐德智), Mr. Li Cunxiong (李存雄), Ms. Zhao Chaoyan (赵朝艳), Ms. Jiang Shan (江山), Mr. Huang Kui (黄葵), Ms. Song Qianyun (宋黔云), Mr. Yang Qingwu (杨庆武), Ms. Chu Yanhong (楚艳红), Ms. Huang Xiaozhu (黄晓珠), Ms. Wang Yuhong (王宇红), Ms. Cheng Xiaochun (陈晓春), Ms. He Jun (何珺), Ms. Tang Jun (唐珺), Yuan Yi (袁毅), Mr. Zeng Jie (曾杰), Mr. Tang Zhi (唐智), Mr. Yang Jun (杨俊), Dr. Li Shi (李实), Mr. Lin Shuming (林树明) and Dr. Wei Gang (卫钢).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chance to show my appreciation to Dr Philippa Moylan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David Beckett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Bick-har Yang, Chen Luopei and Wei Ying at the East Asian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